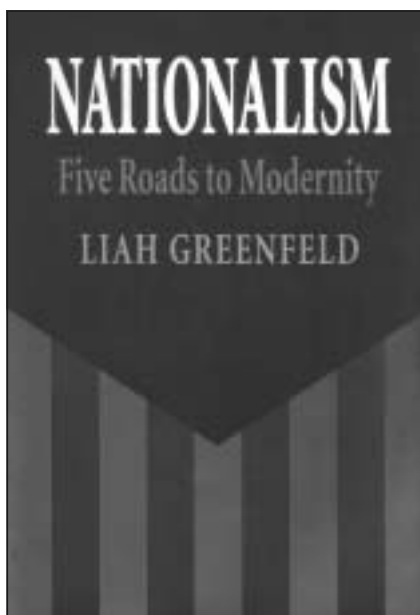


民族主義之「道」

● 魏萬磊



作者先從一個基本預設出發：民族主義是這個世界的根基。然後進一步界定了民族主義這一關鍵字。她將民族看成是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的集合體，而民族主義研究的就是與民族認同、民族意識和民族相關的現象。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戈林菲爾德 (Liah Greenfeld)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陌生，她長達六百多頁的大部頭著作《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已經在2004年以中譯本的形式面世，讓我們領略到這位美國女教授在治學上的博大精深。她的另一巨著《民族主義：通

往現代性的五條道路》(*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引用只註頁碼)自1992年出版後就備受注目，十餘年間已經印刷了七次之多。這本書在今年將會譯成中文出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篇幅近六十萬字，視野開闊，論述觀點新穎獨特，邏輯嚴密工整，論點鮮明犀利，分量很重。筆者全程參與了本書中文版的翻譯校對，在中文本面世之前，特向廣大讀者推介這部煌煌巨著。

作者先從一個基本預設出發：民族主義是這個世界的根基。然後進一步界定了民族主義這一關鍵字。作者將民族看成是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的集合體，而民族主義研究的就是與民族認同、民族意識和民族相關的現象，而作為排外心理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則不在作者的研究範圍之內。該書要探討的具體問題是：民族主義為甚麼出現、如何出現？在從一個社會傳播到另一個社會的過程中，它為甚麼轉型、怎樣轉型？不同形式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為甚麼轉變為制度性的習慣與文化模式、怎樣實現這種轉變？民族主義怎樣塑造了一個社會的社會政治結構？為回答這些問題，作者集中討論了五個國家的情

況：英格蘭、法國、俄羅斯、德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頁3）。

全書共分五章，上述每個國家各佔一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民族觀念的形成看成民族主義唯一的基礎和條件。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就是對共同承認的原則的認可。而實際上，地域、語言、歷史傳統、特定共同體都不是民族主義的固有要素，因此，作者認為「民族主義不必是一種特殊主義」（頁7）。只有當民族主義與地緣政治和族裔約束聯繫在一起，民族主義才產生主權的內涵，具有主權內涵的民族主義被用來判定周遭其他國家和居民時，便有了社會的、政治的、地域的、狹義文化上的獨特感，從而演變成為一種特殊主義。由此可見作者獨具慧眼。

這本書一個最大的特色是，它區分了三個概念：民族國家、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作者更關注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認為民族主義與民主有着天然的聯繫，是民主的載體和形式，人們以民主的名義推動着民族主義的發展。但是，當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條件下傳播時，就由原初意義上強調主權在民的特性，擴展到強調人民共同體的獨特性。民主成為一些民族固有的稟性，這就意味着，民主是無法輸出的，別的民族要接受民主，就必須改變本民族的特性。

與此相連，作者將民族主義分為個體—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和集體—權威主義的民族主義兩種類型。前者表明，民族主義在原則上具有開放性和自願性；而後者表明，民族主義是與生俱來的，沒有

就無法獲取，有了也無從改變。但問題是，個體主義的民族主義只能是公民的，而公民的民族主義只能是集體主義的。個體主義的民族主義僅僅保證了個人固有的尊嚴，而集體主義的民族主義樹立了一個偉大得多、強大得多和更加完美的人的尊嚴。這就出現兩種不同概念的民族主義——非特殊主義的民族主義與特殊主義的民族主義，前者實質上是將民族國家的形成當作民族主義出現的標誌，它是由於結構條件的變化（居民自身特性的改變和提高）而造成民族主義具有了主權的內涵；特殊主義的民族主義則是由於民族國家觀念在輸入其他尚未發生這種變化的國家時，帶來了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方面的變化（新的社會等級結構和秩序形成），這是兩個正好相反的順序。

在作者看來，民族認同並不等於集合體認同，這是一種特定的認同，它不是一個民族與生俱來的天性。「民族認同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適用於不同原料的統領性原則，這個原則賦予原料意義，從而將它們轉化為一種具體認同的元素。」（頁13-14）民族認同的強弱因族而異，它通常發端於怨恨（ressentiment），因為主體（模仿者）相信自身與物件（被模仿者）之間有根本可比性，而實踐中無法取得理論上的平等，因而產生怨恨。這種怨恨所產生的影響，就是類似於「托克維爾效應」所產生的結構失範，其結果是更加強調本民族的特殊性。作者的獨到之處就在於她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民族主義催生了現代化而不是相反，民族性

這本書一個最大的特色是，它區分了三個概念：民族國家、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作者更關注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認為民族主義與民主有着天然的聯繫，是民主的載體和形式，人們以民主的名義推動着民族主義的發展。

作者並不關心民族認同的傳播，而是關注於民族認同的形成；對其研究對象的切入點亦各有不同：對於英格蘭、法國和俄羅斯，它的切入點是貴族；對於德國，其切入點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於美國，是普通民眾。

是現代性的本質原則。因此，她更關注民族認同的基質，特別是本質主義式民族主義的形成和傳播。

這本書的另一大特色是將人的能動性要素納入結構與文化的考察中，從而突破了社會學研究結構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局限：前者將個體思想狀態理性化，從而使得物化的結構控制着個體，造成個體的異化；後者以觀念產生觀念，消弭了人的獨特性。作者對歷史語境描述得細緻入微，同時，對人物心理和形象的刻畫也入木三分，使這本大部頭著作讀起來饒有興味。

同樣可以稱為本書一個特色的是，作者並不關心民族認同的傳播，而是關注於民族認同的形成。作者將這一龐大的主題與個案研究相結合，使得這一宏大敘事內部的豐富性得以凸現，將時間的跨度、空間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作為展現全書立體結構的三維，而且對其研究對象的切入點各有不同：對於英格蘭、法國和俄羅斯，它的切入點是貴族；對於德國，其切入點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於美國，是普通民眾。下面我們就各章的主要觀點予以介紹。

關於英國，作者通過對莫爾(Thomas More)的審判來揭示前民族主義世界觀和民族主義世界觀所造成的認知上的鴻溝，將民族認同當成民族形成的標誌。作者以科學和宗教對於民族認同形成的影響為主線，並以“country”、“commonwealth”、“empire”和“nation”等詞語的含義在十六世紀英國的轉變來說明民族意識的演變，描繪出這些詞語是如何在官方文件中出現並逐

漸添上了現代意義的。作者還揭示了英文版《聖經》在英格蘭民族意識形成過程中的獨特作用：通過閱讀《聖經》，英格蘭平民心中普遍產生一種全新的個人尊嚴感。瑪麗女王(Mary I)血腥統治下對新教徒的集體大屠殺成為民族意識的催化劑，促成了新教徒和民族事業的結合，民族認同逐漸由宗教情緒轉化為民族情緒。這種民族情緒首先表現為對自身語言文字的讚美(頁69-70)，民族主義的語言與宗教語言不同，卻也同樣有號召力。內戰後，一直用來表達民族理念的那套宗教語言很快就被人們拋棄了，民族成為公民效忠的首要目標，不再需要宗教或君主來證明它的正當性了，這使得成熟的民族主義在十六世紀末的英格蘭得以牢牢確立。十七世紀的英國，宗教不再對世俗領域擁有權威，不再是社會價值觀的源泉，而開始適應社會和民族理念的要求。

法國的民族認同經歷了一個三部曲：從宗教認同到政治認同再到民族認同。期間經歷了兩次合法性基礎的轉變：國王取代基督教會—國家取代國王。十七世紀，法國的民族認同完成了轉變，從根本上的宗教認同變為政治認同，認同世俗化的潮流不斷地向前推進。法國有兩個時期(1710至1720年間和1750至1760年間)對「民族」、「人民」、「祖國」和「國家」這些概念使用頻繁，這「表明了忠誠向共同體的轉移以及話語的民族化」(頁160)。民族在法國是和上帝一樣至高無上的理性存在物。法國信奉的是天主教，在這樣的一神教社會裏，兩個至高的神並存是不可思議的。新膜拜的樹

立要求舊膜拜的摧毀，大革命前法國精英階層中反對神像崇拜的趨向，特別是它的反教權主義，正是起源於這種要求。

法國民族思想的哲學基礎是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它要求成員對這個共同體無限忠誠。早期的法國民族主義思想帶有羨憎交織的特徵，憎恨英國的自由派在名義上贊同英國的價值觀，但他們棄絕了英國的自由主義模式，對英國的價值觀進行重新評價。「在那些推進了法國民族意識的泰斗們的手下，民族、自由、平等概念獲得了全然不同的意思，有時甚至與它們在英國的意思截然相反，但這些概念之間依然相互聯繫，並受到了崇拜。」(頁178)「自由」、「平等」、「博愛」在《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中確認下來，並取代了宗教意義上的百合花徽成了法國的象徵。對英國的羨憎交織之情構成了最高知識層次上的法國民族意識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並促成了大眾層次上的民族意識的形成。

在對俄國的論述中，作者主要從彼得 (Peter I) 和葉卡捷琳娜 (Catherine II) 出發。貴族危機是早期俄國知識份子關注的首要問題，在俄國，世襲貴族的地位通過法令的形式被不斷加以剝奪，這就破壞了世系的重要性，因此，貴族生活基礎的價值逐漸消失。而自動的封爵機制導致了貴族等級的膨脹，從深層打碎了沒有保證的認同，摧毀了貴族與外部世界的界限。這兩個影響都加劇了貴族中的不安感，惡

化了他們延宕已久的認同危機，造成他們對最高統治者中央權力和個人權力無法逃避的依賴。這不僅是舊貴族的困境，出身低微的人一旦受封為貴族，他和他的孩子也面臨同樣的認同危機，他們對於自己通過艱苦勞動獲得的貴族地位惶恐不安。葉卡捷琳娜試圖解決貴族的這種認同危機，她加速了貴族對自身境況主觀理解的革命，加快了貴族自豪感和尊嚴感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彼得給了俄國肉體，而葉卡捷琳娜給了俄國靈魂」(頁213)。貴族特權的加速毀滅是俄國民族主義向近代轉型過程中的關鍵步驟，但俄國並沒有完全拋棄傳統，這表現為對母語高度熱愛的語言民族主義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怨恨在俄國民族意識結晶的過程中也有很明顯的作用，由第一代民族主義者對西方公開的憤恨，發展到後來對於西方價值的重新評估。俄國人是怎樣不顧西方的優越、克服了這個障礙並建立起民族自豪感呢？作者告訴我們，俄國回應西方的方式大致有三類：第一個方法是要像西方，模仿它，這個比較容易做到。第二個方法是把西方界定成不適合俄國的榜樣，儘管它有自己的長處，但因為本國與它不具有可比性，所以要走自己的、與西方無關的道路。第三個方法是根除他們意識中的西方形象，用拒絕西方的方式來構建本國的新形象，這種怨恨發酵成一個意識形態的溫牀。

德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顯然不同於英格蘭、法國和俄羅斯。德國民族意識出現得相當晚；它產生於十

值得注意的是，怨恨在俄國民族意識結晶的過程中也有很明顯的作用，由第一代民族主義者對西方公開的憤恨，發展到後來對於西方價值的重新評估。作者告訴我們俄國人是怎樣不顧西方的優越、克服了這個障礙並建立起民族自豪感的。

與其他國家不同，德國民族認同的締造者不是來自貴族和統治精英，而是來自一個特殊的受過教育的平民百姓階層，即職業知識份子。對德國民族意識的性格具有深刻影響的力量是虔敬派和浪漫主義。

九世紀初反抗拿破崙統治的解放戰爭中。與其他國家不同，德國民族認同的締造者不是來自貴族和統治精英，而是來自一個特殊的受過教育的平民百姓階層，即職業知識份子。這裏，作者提出一個有別於文化相對主義的觀念：每一種文化都表現為它的「個性」，文化在何種程度上表達了這種個性是判斷文化類型的唯一標準，文化的任務和意圖就是發現自身的個性。對德國民族意識的性格具有深刻影響的力量是虔敬派(Pietists)和浪漫主義。

虔敬派和清教根本不同，它是一個靜態社會的宗教意識形態，它的成員不諳塵世成就，但諳熟其中的困苦與災難，它主要來源於比加爾文主義(Calvinism)更能適應德國不同階層需求的路德主義(Lutheranism)。虔敬派利用官方宗教表達自己的宗教哲學：在現實秩序中受苦既有意義又有價值。浪漫主義徹底貶低理性，對個人自由不理解也沒有興趣。作為自由的必然結果(在英美法政治思想中)的平等，也完全被排斥了。由於啟蒙的價值不再被高估，愈來愈多的市民正視現實，使得德國民族認同逐漸世俗化。

相對而言，知識份子無法逃避自己的身份宿命，最終找到了一個還算不錯的解決辦法：他們轉變自己的形象，由社會批判者轉為現存價值的維護者，民族認同就是該轉變的最終結果。也正是在與法國交戰過程中，普魯士的戰敗最終宣告了德國民族主義的存在。德國民族主義在相繼幾代受過教育的市民持續的困境中形成和強化，深入德國

人的靈魂，成為其思考和感覺的方式，「虔敬派—浪漫主義心態」在解釋着德國民族觀念的全新意義。

美國民族認同感的形成受到英國殖民者的影響。後者身上帶有既定的民族身份，他們對自己所屬的共同體有一種歸屬感，而這一民族觀念為北美人所繼承，促成一個奇特的現象：美國的民族認同不僅先於特有的美國人觀念的形成，也先於這個民族制度體系的形成，甚至先於其國家領土的形成，民族主義在美洲社會是一個引數。宗教自由是形成美國認同感的主要因素，對清教的調解和對自由的熱愛成了美國的獨特之處，但美國獨特感的形成絲毫沒有妨礙北美人對英國及其民族認同的忠誠。美國平等的社會環境使英格蘭民族性的精髓得以保留，使美國人得以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挫敗感得以宣洩。

雖然美國國力的增強使美國人感到自豪，但文化獨立性以對民族共同體的統一理解為先決條件，而這個統一的民族認同感並不存在。對於組成統一體的個體獨立性的強調與要求統一的民族認同之間構成緊張，但也正是對個體的強調以及對民族統一觀念的反對，凸現了美國民族意識的獨特性。反智主義在這一過程中作用很明顯：美國知識份子反對個人崇拜，但尊重知識和理性，這就形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民族認同。個人民族主義在民族的地緣政治構建不明確的條件下，其內部矛盾可能產生政治上或地理上的脫離傾向。美國成功界定了自己的地緣政治，使得脫離傾向不再可能，個人民族主義的不滿就指向了

內部改革，社會本身成了新的邊界，變得更具包容性並符合更多的利益。可以說，美國民族的獨特性在於個人主義原則及公民民族主義的實現。

作者最後總結說，民族主義可追溯到等級社會的結構矛盾，它是受這些矛盾影響的個體對自己製造出的無序感的一種反應。選擇民族主義並非不可避免，舊社會的瓦解也並非必然，但民族主義一旦被採納，就會加速這一變化進程，民族主義將這個社會引向某一方向，而且限定了它在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從而成為這個進程中的主要因素。如此一來，這個進程就完成了從舊秩序到現代性的社會大轉型。舊社會被基於民族性原則的新社會取而代之。現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就是民族主義想像的實現，它是由民族主義創造出來的。這就是由以上幾條通往現代性的道路得出的民族主義之大「道」。

作者避免採用下定義的方式對文中所涉及的複雜概念進行周全而嚴密的概括，而是以描述的方式幫助我們理解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這是本書的一個特色，但也可能是本書的一個缺點——對於習慣了本質式理解的中國學者，似乎一下子很難接受。但無論是從本書的論證過程，還是所要表現的主題來看，其內容和形式、思想性和學術性都達到了平衡和統一。從中國古代的漢學宋學之爭到西方現代斯特勞斯學派 (Straussian) 與斯金納 (Burrhus F. Skinner) 學派的對立，都在表現着學界對宏大敘事與瑣碎經驗研究無法平衡的兩難處境。事實上，兩種治學方法的對立是一個假問題，產生思想的不是書本，而是思想本身。而思想要得以表達，就無法離開文字，無法離開具體的語境，義理和文字非同時存在不可，問題意識和問題產生的歷史語境都是不可或缺的，作者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選擇民族主義並非不可避免，舊社會的瓦解也並非必然，但民族主義一旦被採納，就會加速這一變化進程，民族主義將這個社會引向某一方向，而且限定了它在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從而成為這個進程中的主要因素。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7年12月號、2008年1月號

- | | | | |
|------|---------------------------------|---------|----------------------------------|
| 第69期 | 2007.12.31 | 第70期 | 2008.1.31 |
| 喻 鋒 | 從歐盟對中國國際責任的「關切」看中歐關係新變化 | 馮 超 | 民國初期的軍人學生與社會演變 (1912-1922) |
| 吳 磊 | 新加坡對台灣政策述評 | 劉德軍 | 對中共發動「三反」運動的考察 |
| 賈慶軍 | 秘密的世界及其成因——美共與莫斯科情報機構的關係探析 | 董國強 | 從南京大學的「清隊」運動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轉化及其後果 |
| 雷志宇 | 轉型期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研究述評 | 劉工昌 | 由《讀書》的轉型看中國學術媒體處境的尷尬 |
| 李嘉慧 | 在回歸十年裏——內地人眼中的香港作家「董橋」 | 謝燕清 | 盧兄之死 |
| 郭振杰 | 「法」治與「政」治的角力——就香港法治實踐主線與陳弘毅教授商榷 | 吳海清、張建珍 | 全球化：西方中心抑或世界共同體？——《面紗》與《通天塔》比較研究 |
| | | 黎 錫 | 對《中國電影圖史》香港部分的一些意見 |